

贡献、挑战与应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发展研究

张敬婕

摘要：女性自进入新闻与传媒行业以来，便为这一行业带来了性别结构、性别经验、性别视角的改变。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贡献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不过，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影响，女性传媒工作者仍然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与价值低估。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对策，在于对女性的多重劳动价值的认知与认可，赋女性价值予公正的评判与认同。

关键词：女性传媒工作者；改变；挑战

作者简介：张敬婕，女，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 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7) 01-0046-06

在信息时代，新闻工作者通过参与新闻生产改变着社会生态、人们的观念，甚至推动了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变革。而新闻工作者的发展现状、角色认定与价值认可，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对传媒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聚焦女性传媒工作者对这一行业的贡献，归纳她们所遭遇的普遍性的挑战，并对超越现实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

一、女性传媒工作者为新闻与传媒行业带来的改变

纵观女性进入新闻与传媒行业的历史，可以看到，女性为这一行业带来了很多改变：

1. 改变了这一行业的性别结构

1849年，第一位女通讯记者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报道了路易·拿破仑率法军入侵罗马的消息。而中国女性进入新闻和媒体行业可追溯到1897年，康同薇在澳门的《知新报》担任翻译和撰稿人；陈撷芬于1899年在上海创办《女报》并担任主笔，她们是中国最早的女新闻人。

自玛格丽特·福勒起，女性从个体到群体，为新闻与传媒行业增添了一股柔性的色彩。根据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跨国研究发现，女记者占到全球记者总人数的36%。^[1]《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4》则显示，中国新闻从业者中女性数量已经超过男性，占51.5%。^[2]

2. 改变了这一行业的性别经验

传统性别观念使得新闻与传媒行业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业内的“性别隔离”，具体表现为将女性设定在“软新闻”领域，而将男性设定在“硬新闻”领域。虽然从事“硬新闻”报道的女性数量确实存在着从少到多的变化，但事实上，女性在战争、政治等“硬新闻”领域从未缺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在传统的“硬新闻”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松动了这一行业对女性能力和贡献的刻板印象。

首先，战争并未使女性走开。1943年，29岁的张郁廉加入中央通讯社，她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25岁的笹本恒子（Tsuneko Sasamoto）曾利用相机记录下日本正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生百态，她是日本的第一位女记者。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被称为“战地玫瑰”、华人女性的骄傲。2001年她三入阿富汗，成为进入阿富汗的第一位华人女记者。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她

又成为进入伊拉克战地的中国记者第一人。^[3] 她以敏锐的观察，通过捕捉巴格达民众对于美军的态度变化，呈现了海湾战争与国际政治背景之下普通民众的心理与诉求。截至2015年，我国中央级媒体外派记者中有很多女记者的身影，她们活跃在世界各地，包括一些战乱和贫困的国家。

其次，政治也未使女性走开。中国民国时期的浦熙修，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策划并进行了38位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专访，其因客观和细腻的笔法，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典型范例。1961年，40岁的海伦·托马斯成为了美国白宫记者团的第一位女记者。作为长达50年的白宫报道记者，从肯尼迪到奥巴马，海伦·托马斯以其锐利的视角和尖锐的发问方式而著称，以至于美国新闻业称白宫有两套新闻规则，一套适用于普通的记者，一套适用于海伦·托马斯。^[4]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则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使圆滑老练的基辛格最终坦承越南战争毫无益处。目前，中国媒体中负责时政类采访的女记者比例已经普遍达到一半以上，在中国驻外媒体记者中，女性的比例亦达到40%。^①

再次，女性传媒工作者为这一行业带来了特殊的性别经验。有学者研究发现，在采访过程中，对于一些敏感问题，男性记者往往单刀直入，而女性则更加善于倾听，对于被采访者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她们会选择迂回前进，在不厌其烦的交流中寻找合适的切入点。^[5]

总体来看，女性传媒工作者每天都在参与报道最重要和最具有挑战性的事件，她们投身一线，无论是报道文化新闻，还是报道国际政治、社会和经济纷争、暴乱与战争，她们的存在、她们的报道方式和报道内容，无疑凝聚了女性观看世界的方式和女性体验世界的感受。

3. 改变了这一行业的性别视角

研究显示，女性传媒工作者不仅将女性的生活经验带入到工作作风中，更重要的是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了新闻与传媒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中。比如，在策划新闻报道时更注重从微小的细节入手，擅于挖掘被隐藏和被遮蔽的人物关系和权力关系。她们更乐于运用感性思维、站在受访者立场上提出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受访者的心理，因而往往能够挖掘出更多直逼事件本质的信息。^[6]

笔者通过对曾经编辑和制作过具有性别视角新闻的女记者的深访发现，女性传媒工作者根据自身的差异性经验，将充满社会公正与性别平等的性别视角带入了新闻制播中，从而改变了新闻呈现的样态：“在报道李天一案时，我们媒体报道了女性律师的观点，她提出本案适用于加重刑法及其依据。我注意到其他媒体大多报道了男性律师的专家意见，而他们一般对本案提出了适用于减轻刑法及其依据。”“女性犯罪的新闻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比较注意避开对女性当事人的过度描写。现在有些媒体的报道都是‘知音体’，追求故事性，弱化了新闻本身的价值。另外，有些社会新闻会涉及一些敏感的性别问题，比如拐卖女性，性侵女童等等，我们在报道的时候也会比较注重分寸。因为这些议题本身都是敏感的热点议题，人们的关注度已经很高了，人们更想读到的是我们媒体的立场。如何呈现我们媒体的立场呢？主要是通过议程设置。比如性侵女童的报道，我们不仅报道这一个事件，我们还要找出以往类似的事件，不能让公众将性侵女童仅作为一个个案来认知，要认识它的危害性，必须从提升全民关爱女童的意识入手。在报道施暴的男性时，一般的惯例是想挖出一些性格缺陷或者所谓的背后的故事，但近年来的案例都说明犯罪的都是普通人，他们有性格上的问题，也有观念意识和行为约束上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还会报道一些周边人士对施暴男性说好话的内容，来让公众认识到施暴者没有戴着‘我是禽兽’的面具。”^[7]

二、女性传媒工作者发展现状与面对的挑战

女性传媒工作者以其执着、勇气、正直和激情，诠释了职业良知与职业素养。她们对于新闻与传媒

① 该数据来源为2015年3月20日，由中华女子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共同举办的“性别平等与媒介责任”研讨会上，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首都女记者协会副主席王冬梅的发言。

行业的贡献,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在2016年颁发的普利策新闻类奖项中,个人名义的获奖者共19人,其中7名是女性。女性新闻人的表现令人瞩目:美联社4名女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调查和揭露了东南亚海鲜食品业中的奴役现象,协助解救了320名劳工,引发了印尼和泰国政府的重视,从而获得了普利策奖最高荣誉“公共服务奖”。《纽约时报》的女记者艾丽莎(Alissa)对长期饱受折磨的阿富汗女性进行了详尽的报道,使阿富汗女性得以发声,因此获得了“国际报道奖”。

中国女性传媒工作者作出的贡献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与认可。“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宣传部批准的全国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截至2015年已经举办了25届,其中个人名义获奖者共1990人,女性有373人。女性获奖比例为18.7%。“金话筒奖”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最高荣誉,于1993年设立,2006年升级为国家级奖项。截至2015年该奖项已经举办14届,获奖者共274人,其中女性有169人。女性获奖比例为61.7%。“韬奋新闻奖”创办于1993年,是中国记协和中国韬奋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奖励我国新闻工作者优秀成果的最高荣誉奖,也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常设的全国性新闻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共举办了6届,选出56人,其中女性15人。女性获奖比例为26.8%。从2006年开始,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截至2015年已举办了7届,韬奋系列共评出68人,女性有6人,女性获奖比例为8.8%;长江系列评出70人,其中女性18人,女性获奖比例为25.7%。^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新闻与传媒行业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但是女性传媒工作者遭遇的现实挑战依然严峻:

1. 女性身份使女性传媒工作者成为了被观赏和被污名化的对象

社会对于女性传媒工作者关注最多的是她们的女性身份而不是职业身份。早期的女记者为了消除人们对女性身份的歧视和偏见,“刻意穿男士军装、任何女性化的装饰都被抛掉和遮掩”,“女名改男名的现象也很常见,如抗战时期从事战地宣传工作的郁风、戈扬,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战地报道的张力(原名张丽君)、朱军(原名朱佩莉)等”^{[3](38)}。

受传统性别观念的桎梏,在当下社会中,人们对女性传媒工作者的外貌和隐私过度关注,常常忽略了其专业品质和职业素养,女性身份反倒使其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比如《纸牌屋》中对女记者的塑造围绕着“性交易”、“政治丑闻”——“无论女记者的目的是接近真相,还是接近权力,她们的存在给虚构和真实的政界新闻界带来了无法赶超的收视率。而有收视率的女记者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纸牌屋》第一季里女记者佐伊借安德伍兹的爆料出名后,因为在电视采访中批评所在报社被主编大骂,继而被解雇。报社同事更直接质问她到底是和谁上床才拿到第一手消息。”^[8]

英国德莫斯智库(Demos)2014年的研究显示,新闻业是唯一一个女性遭受更多辱骂的行业,女性新闻工作者遭受的辱骂是男性的3倍。^[1]

2. 女性进入媒体领导层的比例依然偏低,女性并没有真正掌握媒介的话语权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2015年的统计发现,在全球媒体的决策层当中,女性只占到四分之一的比例。^[1]在中国媒体行业的决策层中,女性高管比例约占三分之一。

根据“我国大众传媒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传播研究”课题组2013—2014年对中国广东卫视的《午间新闻》、江苏卫视《江苏新时空》、天津卫视的《12点报道》、安徽卫视的《每日新闻报》、青海卫视的《午间360度》进行的性别监测发现,女记者的出镜率远远高于男记者(见图1),女主播的数量也

① 中国新闻奖、金话筒奖、韬奋、长江新闻奖的数据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5级媒介与女性方向研究生王彤、李若婕、安慧敏的帮助。

远远高于男主播（见图 2）。^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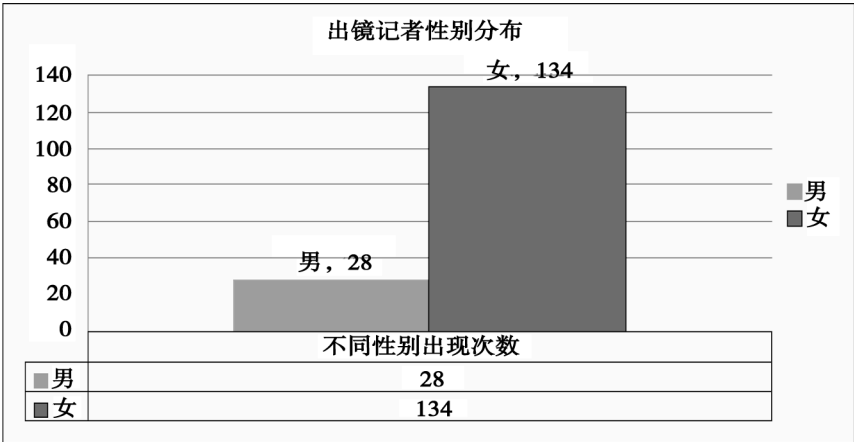


图 1 出镜记者的性别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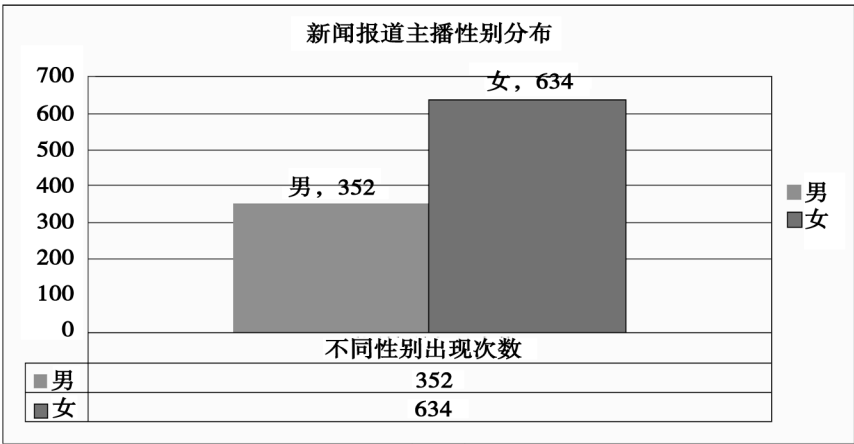


图 2 男女主播的性别比例

但是，女性并没有掌握媒介的话语权，男性作为信息和意见来源者的比例为 47.43%，女性则仅为 17.15%。和女性相比，表达意见的男性更多以专家和发言人的身份出现（见图 3）。女性作为信源、作为新闻人物的比例仍然很不足。另外，在对女性进行报道的时候，年轻漂亮的女性更有媒介使用的优势，而其他女性群体则很少得到媒体呈现。^[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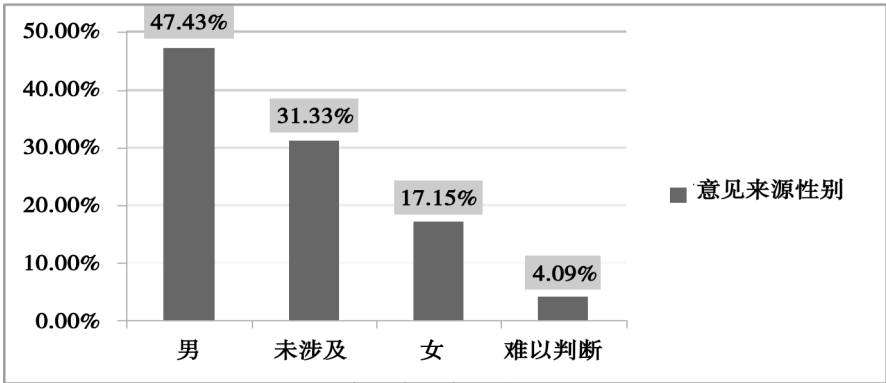


图 3 专家意见来源的性别比例

① 抽样样本为五档新闻节目 2013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分层随机抽取的各 14 期节目、共 1010 条新闻进行了性别监测。

3. 对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职业价值认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

技术发展消弭了两性因生理差别而带来的劳动分工的必要性,但是,男女两性劳动力价值的评价等级与鸿沟依然存在。在没有解放“妻职”和“母职”的前提下,职业女性往往承受着“双肩挑”的压力。而现有的劳动力价值评估指标中,女性承担家务劳动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且“不具有市场价值”的。因而,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仅得不到真正的认同,反而成为了女性进入职场,参与晋升和竞争的“劣势”。

总体而言,在全世界的媒体中,女性的媒介形象依然存在着刻板化塑造与认知的现象,女性对新闻和媒体行业带来的价值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认知与认可。媒体制播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性别歧视。

三、女性传媒工作者超越现实问题的应对策略

女性传媒工作者遇到的问题,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当前,全球女性传媒工作者都在积极探讨应对之策,也希望通过完善政策机制、改善性别文化,促进女性传媒工作者更好地发展自身,同时也为新闻与传媒行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自世界第一份妇女权利宣言诞生之日起,200年来世界各国以及各文化样态下的妇女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经济权、教育权而不懈努力着。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平等”不仅仅意味着“结果平等”,更包含着“机会平等”与“过程平等”;在争取各项权利平等的努力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对女性价值的理论认同与现实认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性别研究者的普遍共识是,解决女性传媒工作者当前遇到的普遍性问题的途径,不应该仅仅是教导女性去改变自己,更不应该是贬低女性的能力,让女性按照男性的标准去做。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思和消除我们在价值评价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从理论上讲,切实提升女性在包括新闻与传媒行业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平等程度,归根结底需要建立在对女性价值的普遍认知与确实认同上。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域下,人的认知被划定为“开放区”、“盲区”、“封锁区”和“未知区”。^[10]具体到性别因素,“开放区”主要指人们认可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认可人与人不应仅仅基于性别差异而存在价值评定的高低之分。“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已经在中国实行了二十余年,无论是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法律与文化层面,都在不断向着公正与平等发生着积极的改变,但是受各种现实因素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在面对很多具体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忽略性别平等原则。比如一些优秀的女性已经和男性领导者一样承担着传媒行业发展与领航的责任,但是人们对她们的评价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某种“担忧”与“质疑”。归根结底,她们遭受“双重标准”的原因主要在于她们的性别。

“盲区”主要指人们因生理、种族、教育素养、社会阶层等因素而对女性的具体处境和不平等状况“视而不见”或“漠不关心”。在传媒业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叫做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可见这个行业的发展强度和工作压力之大。即使女性与男性做着同样的工作,她们与男性相比,投入工作的准备(包括各种成本)却有着巨大的不同,因为她们往往需要克服很多来自自身的困难(如经期、孕期、产期)和家庭的苦难(女性往往承担着照顾家人,特别是老人和病人的责任),但是在考评优秀和选择晋升人选时,女性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和为克服困难所做出的努力不被计入考量指标体系之中。

“封锁区”主要指人们因存在利益纷争而导致对女性平等事业抱有敌意或误解。特别是当自身的利益可能因坚持性别平等原则而受损时,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通常会将“性别平等”排在价值序列的末端。在人们日常交流的语境中,“女强人”其实是个贬义词,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女性往往因其性别和优秀反而受到责难。

“未知区”主要指人们因为固守传统观念而不认可存在“女性价值”,习惯于将男权思维等同于人类的普遍思维。当需要请一位专家的时候,有些传媒会注意到性别均衡问题,但是更多的传媒机构、节目制播团队会优先考虑男性专家,好像男性专家比女性专家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这种认知不仅不具有可信性,而且充满了性别歧视。

确立女性价值认同，尤其是提升社会对女性传媒工作者的价值认同，首先要努力缩小“盲区”与“未知区”，通过普及性别视角以及女权主义学术成果，提升人们的性别敏感与性别素养。因为很多歧视并非仅仅存在于传媒行业内，而是具有社会普适性的问题。作为反映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平台，传媒行业理应将传播性别平等作为其重要使命和重点工作。其次要通过缩小“封锁区”而扩大“开放区”，强调男女平权不是女夺男权，而是将两性从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与性别文化中解放出来，消除误解与敌意。

参考文献：

- [1] 全媒派. 2015 全球新闻编辑室趋势报告 [EB/OL]. <http://news.qq.com/original/quanmeipai/quanxiuxinwenbianjishi.html>.
- [2] 网易新闻. 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 2014 [EB/OL]. <http://news.163.com/AB0MHV1F00014AED.html>, 2014-11-14.
- [3] 王黎燕. 走进硝烟里的中国战地女记者 [J]. 军事记者, 2005 (3): 40.
- [4] 中国广播新闻晚高峰. 美国传奇女记者海伦·托马斯去世曾被誉为“总统折磨者” [EB/OL]. <http://china.cnr.cn/xwgf.shtml>, 2013-7-21.
- [5] 王译萱. 试析女性记者的职业优势 [J]. 新闻研究导刊, 2014 第 5 卷 (11): 59.
- [6] 谢玄曦. 从张泉灵看女记者的工作优势与劣势 [J]. 传播与版权, 2015 (4): 14.
- [7] 张敬婕. 制作出性别敏感的新闻是否可能——基于对北京市 10 家媒体机构 40 位媒体从业者的深访 [J]. 现代传播, 2016 (2): 69.
- [8] 苏贝贝. 真实版《纸牌屋》：华盛顿里的政客、说客和女记者 [J]. 中国经济周刊, 2014 (8): 80.
- [9] “我国大众传媒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传播研究”课题组. 男女平等价值观传播视角下电视新闻节目监测报告：以中国大陆地区五个新闻节目为案例 [A]. 刘利群, 陈志娟. 媒介与女性蓝皮书：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2013-2014）[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233.
- [10] 孙英春. 跨文化传播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28.

[责任编辑：詹小路]